

一座钟楼校准城市时序,一张地图承载爱国情怀。2026年2月4日,泉州“钟楼之父”雷文铨诞辰139周年之际,一份尘封了九十余载的抗战地图手稿首度公之于众。这张手绘于硫酸纸上的珍贵文献,不仅填补了泉州近代史料的一处空白,更将这位集城市规划师、工程师、爱国者于一身的先贤,重新拉回公众视野。

融媒体记者 颜瑛瑛 王了 蔡紫曼 赵伟 吴昭斌

泉州「钟楼之父」 手绘抗战地图首度公开

钟楼修建缘起揭秘 百年工程留筑世遗



《晋江惠安仙游三县沿海仇货入口地图》手稿 (雷晶晶供图)

赤子之心 抗战烽火中技术报国

昨日,雷文铨的同族晚辈雷晶晶女士向本报记者独家展示了1932年雷文铨为抗日救国会绘制的《晋江惠安仙游三县沿海仇货入口地图》手稿——这是该手稿首次公开亮相,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“仇货”是民国时期的特定历史用语,特指敌对国家输入的商品货物。记者看到,这份手稿绘制在一张透明的硫酸纸上,笔触精细、标注详实,清晰标明了当时晋江、惠安、仙游三县沿海地区仇货的主要入口、销售点,同时准确标注了县城、重要村镇、河流及汽车通行路线。作为当年泉州抗日救亡工作的参考资料,这张地图助力当地阻断敌对物资流通,在泉州抗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这份地图,并不是雷文铨为泉州所绘的第一张专业地图。泉州文史专家杨清江介绍,20世纪20年代以前,

泉州城区街道狭窄,市容落后,仅一丈余宽的街道上,商铺遮阳棚交错搭接,行人摩肩接踵,拥挤不堪。归国参加辛亥革命的陈新政、戴愧生等人目睹家乡落后面貌后,力促当地官员兴办市政、拆城辟路。

1922年,同盟会会员叶青眼组建泉州市政局,力邀海归工程师雷文铨出任总工程师。上任伊始,雷文铨便启动了一项奠定泉州近代城市格局的基础性工作——绘制《泉州地图》。他摒弃传统测绘方式,运用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所学的近代科学测绘技术,采用1:5000的比例,对泉州城区进行勘测绘图。这张地图是泉州第一张“采用近代科学方法测绘的城区平面图”,成为中山路精准布线、排水系统科学规划的底版,也是泉州城市建设“规划先行”现代理念的早期实践。



钟楼之谜 修建真相击碎88年误传

“东西双古塔,南北一长街,路上三岗亭。”这句口口相传的民谣,镌刻着老泉州的城市记忆。其中三座“岗亭”,两座已湮没于岁月洪流,唯有中山路与西街交汇处的钟楼,历经岁月洗礼依然矗立。它既是泉州古城的标志性建筑,更是这座城市的时间图腾。作为泉州“第一个公共时钟”和“最早的现代路灯”,它在泉州民众日常生活中引发了一场“改造性体验”,从“天色看时间”到“钟楼看时间”,人们对时间的掌控度似乎有了更好的把握。

这座标志性建筑,于1934年动工、1935年竣工,高13.8米,为钢筋混凝土结构。其下端为四脚分立的底架,拾铁梯可至二楼;二楼之上,四面各悬挂一枚德国制造的圆形时钟,钟面仅有时针和分针,采用罗马数字计时,外层装有玻璃钟罩防尘防雨;钟楼顶端设有标注“东南西北”的方向标,底架巧妙融入中国传统斗拱造型,整体兼具西方建筑的简约利落,清雅别致,是当时泉州城内唯一的公用时钟。

“少年时见钟楼钟面直径五六尺,立于街口,四面皆可望见时刻;入夜后,钟体内电灯亮起,时间依旧清晰可辨。”1925年出生的泉州籍台胞王人瑞在文章中,记录下了钟楼当年的模样。他回忆,钟楼四面曾刻着当时名流政要的题字,其中便有主持建楼的晋江县长张斯磨的手迹。20世纪50年代钟楼翻修时才被抹去。

20世纪30年代公共计时工具极为稀缺,这一时期钟楼一度成为各地统一时间、服务市民与航运的重要设计。如北京西交民巷大陆银行钟楼、上海跑马总会钟楼、重庆万州西山钟楼等,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但相较于这些知名钟楼,泉州钟楼的设计者长期隐匿于历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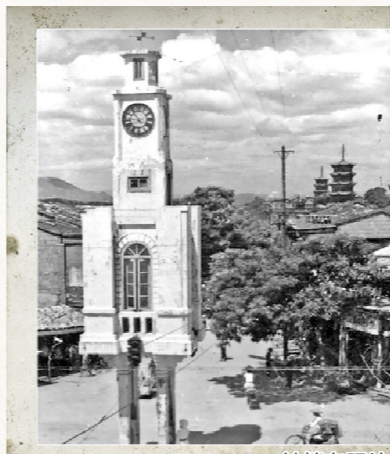
幕后,其修建缘起更是被误传了88年。“修建钟楼,并非因‘护士被逼婚自尽、县长赠礼修楼’,这是误传。”在泉州市区镇抚巷,九旬老人辛梅松向记者揭开了真相。辛梅松出生于1931年,其父辛春渊是雷文铨的学生,曾跟随雷文铨参与中山路设计、中山公园七十二烈士碑修建、泉州汽车站建设等多项工程。辛梅松自幼在钟楼附近长大,儿时还曾见过钟楼的设计图纸,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刻记忆。

他介绍,1934年,时任晋江县长张斯磨响应“新生活运动”号召,提倡守时之风,遂委托雷文铨设计修建钟楼,这一史实有当年发行的报纸为证。钟楼中部北面镌刻的“晋江县长张斯磨建”落款,仅表明建楼的主导者,并非所谓“赠礼道歉”。

而钟楼所在的中山路,正是雷文铨主持设计施工的经典之作。1923年,雷文铨受聘担任泉州中山路工程工程师,当年便居住在中山中路陈光纯故居。其夫人衣着入时,举止优雅,街坊邻居留下了深刻印象,后来雷文铨还在镇抚巷36号附近置业定居。

设计中山路时,雷文铨立足泉州实际,借鉴欧洲城市建设经验,规划开辟十余米宽的汽车道(可兼行电车),路边种植乔木遮荫,街道两旁建筑统一采用东南亚“五脚架”骑楼风格,设置2.5米人行道和2.7米店铺廊道,可遮风挡雨、便利行人。工程最初从顺济桥至亭前街动工,命名为“南新马路”,同时配套修建阴沟排水系统,将污水注入八卦沟,并疏浚八卦沟水系,工程完工后,潮汐往来、水波荡漾,轻舟可直抵花桥亭下。

任职期间,雷文铨曾两度出任市政局局长,主导泉州城市建设升级。



钟楼老照片 (市城建档案馆供图)



中山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 (市城建档案馆供图)

泉郡骄子 深耕故土留筑经典城市遗产

雷文铨祖籍南安码头铺前村,其祖父雷正中是19世纪50年代移居厦门鼓浪屿的华人西医,父亲雷源崇为雷正中次子,雷家大厝在鼓浪屿被称为“雷厝”。

雷晶晶女士收藏的雷文铨结婚证书显示,雷文铨生于清光绪十三年(1887年)。他自幼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在厦门英华书院就读时,因成绩优异受到英国教师赏识,被推荐前往英国留学。1902年,15岁的雷文铨远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,攻读土木工程专业,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,获硕士学位,成为当时闽南地区为数不多的海归工程专家。

学成归国后,雷文铨先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一年,随后投身工程建设事业。1913年,他受邀担任福建永德安公司总工程师,前往安溪潘田铁矿开展路线及矿区地形勘测工作;翌年,受旅日泉籍华侨陈清机之邀,出任泉安公路总工程师,牵头推进福建第一条民营公路的勘测设计。后因工程受阻,雷文铨转赴北平,任职于治河处,同时在北京大学、交通大学任教,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更多青年学子。

1919年,受爱国华侨许卓然、陈清机邀请,雷文铨回到家乡泉州,继续进行泉安公路、安海大街的勘测设计工作。泉安公司的桥梁、涵洞、车站、码头及各类楼房,均由他亲自设计。其中,安海大街改建开创了闽南旧街改造的先例,泉安公路则成为福建省第一条公路。1922年6月,全长28公里的泉安公路建成通车,因其设计科学、施工精良,被誉为“国内设计最佳之路线”。

1928年,雷文铨主持泉州中山公园工程建设,亲自设计了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。这座纪念碑造型独特,碑身为棱角构筑物,碑体上72个尖顶象征72位烈士,承载着深厚的爱国情怀,成为雷文铨工程师生涯与泉州城市历史交融的见证。虽该纪念碑实物已不复存在,但通过老照片与市民们的回忆,其承载的历史分量与精神价值依旧清晰可感。

在建设城市的同时,雷文铨始

终坚守文物保护理念。旧时代的顺济桥为石板古桥,因年代久远,受洪水损毁,无法通行汽车。1931年,雷文铨受邀着手修缮顺济桥。改造过程中,雷文铨坚持“保护原貌、兼顾实用”的原则,保留了原桥三十孔的结构形制,历时近两年完成修缮,耗资16万元。在此期间,雷文铨还为漳州新华路中心区设计了“延誉亭”,为祖籍地南安码头设计了永贞桥,为南安诗山设计了潭美桥,每一项工程都彰显着他的匠心与专业。

数十载深耕故土,雷文铨不仅留下了一座座经典建筑,更躬身育人,培养出一批本土工程技术人才,辛春渊、陈文通、蔡晋楚、蔡明哲、王振声、韩紫云等人均是他的弟子,后来成为闽南地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。

凭借卓越的专业水准与成就,1936年雷文铨应邀进京,出任当时的京甬铁路河汾溪段段长;1938年,调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任职,后随单位西迁重庆,历任西南运输公司总工程师、贵州省建设厅总工程师。抗战时期,为保障抗战物资运输畅通,他临危受命驻守中缅边界,主持滇缅公路桥梁、桂越铁路、滇缅铁路等重要交通线的勘察与营建——这些线路是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国际通道,堪称“抗战生命线”。

从泉州城的街巷桥梁,到滇缅边境的战略通道,雷文铨的工作重心转变了,但报国初心始终未改。长期的野外奔波与高强度劳作,让他不幸感染恶性疟疾。1945年,雷文铨在缅甸仰光医治无效逝世,终年58岁,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家国的岗位上。

雷文铨的“遗产”,不止于中山路的骑楼、钟楼,更在于他用一生践行的“科学规划、匠心筑城、家国同心”的精神。百年光阴流转,匠心精神永存。雷文铨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,为泉州留下了坚实的城市根基与深厚的文化遗产。他的故事,是泉州城市发展的缩影,更是中华民族爱国知识分子“技术报国、匠心筑梦”的生动写照。



泉州钟楼设计者雷文铨 (雷晶晶供图)



(CFP)